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5.003

“两个结合”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生成

李戈,薛添仁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 and 实现“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和光辉典范。毛泽东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指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动力,阐发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一系列实际问题。在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筑军事辩证法哲学基础上,毛泽东等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军事理论精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兵家文化相结合,系统论述了积极防御中攻守进退和人地得失的辩证法、抗日战争中内线持久防御战略和外线速决进攻战术的辩证法、军事指挥中集中分散和强弱转化的辩证法,给我国兵法宝库增添了全新内容,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关键词:毛泽东;“两个结合”;军事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5-0018-08

一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两个结合”的理论成果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途径,是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旧哲学化的马克思主义、机械化的马克思主义、线性化的马克思主义等假马克思主义类型的自觉拒斥^②。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集体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兵家文化相结合的杰出理论成果。毛泽东等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始终坚持批判吸收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和中华传统兵家文化,提出了关于战争规律性质、军事战略战术、军队政治工作和国防建设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问题,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军事理论的继承和超越。

(一)毛泽东通过“两个结合”构建军事辩证法思想何以可能

近代中国革命战争既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具

有相似性,又出现了中国历代战争不曾有的新方向、新特点和新要素,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实现“两个结合”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比较选择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优秀传统军事理论是中国历代战争的经验总结和精华萃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优秀传统军事理论的耦合,不是在纯粹的理论观念中就可以实现的,而需要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完成。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适应中国民主革命战争实际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农民革命战争,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其中的新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指导它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根据中国近代社会出现的新要素、新形势提出正确的军事路线、方针和策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和国

收稿日期:2024-07-22

作者简介:李戈(1989—),男,陕西宝鸡人,博士,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研究。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页。

②王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相结合”重要论述的本体论意蕴》,《湖湘论坛》2022年第2期。

防建设实际相结合,创造性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包括十大军事原则在内的军事理论成果,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①。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战例军史能为中国近代革命战争提供有益借鉴,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传统军事理论进行科学总结和提炼的有力理论工具。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古代频仍的战争催生了一大批军事理论家研究战争经验和规律,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兵家典籍。这些传统军事理论蕴藏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思想和正义主张,具有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结合的内在可能性。而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许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和农民起义的成功实践,又能为近代中国革命战争提供极其有益的借鉴。毛泽东等正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成功萃取中华传统兵法韬略的精华,用其分析和总结中国历代战争的历史经验,最终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二)毛泽东以“两个结合”构建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主要路径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筑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理论基石。粟裕曾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绝不是几条固定的公式,错综复杂的战争进程也绝不是战争指挥者提前就能规划好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战争的实际问题,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民主革命战争的根本性质和目的,正确认识和处理战争和政治、军队和政党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研究敌我双方的具体形势和战争规律,科学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坚持用辩证唯物认识论概括和总结指战员对军事战争规律的认识过程,从而为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奠定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二是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问题出发,形成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主体架构。“毛泽东军事思想所以是正确的,就在于他紧紧掌握了唯物论和辩证

法,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③残酷复杂的中国革命战争给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艰巨的时代课题,迫切地要求他们坚持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分析战争形势、认识战争规律、制定战略战术。在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问题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创立了一整套闪耀着辩证法光辉的唯物主义用兵新法。

三是吸收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和传统军事理论精华,丰富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内容。毛泽东在指导革命战争和总结战争经验时,不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还高度重视古代战例军史和传统典籍中对军事一般规律的总结和军事战略战术的提炼。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仔细研究和认真总结中国战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和古代历次农民起义的成败得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质性地、批判性地、创造性地汲取中国传统兵家典籍和军事文学中所蕴含的军事智慧,结合自身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实际经验对其赋予新内容、新思想,从而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三)毛泽东以“两个结合”构建军事辩证法思想的重大意义

一是指导中国民主革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战略战术理论的精华,始终坚持站在人民立场上总结革命战争经验,根据近代中国社会的新要素、结合近代中国革命的新要求、抓住近代中国战争的新动力,建立了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提出了一整套指导人民战争和革命军队建设的军事辩证法思想,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和打破了一切反动派及其军事进攻,成功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绝不会心甘情愿地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暴力革命是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必由之路,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②《粟裕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09页。

^③《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页。

础”^①,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议题。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问题,在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斗中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②,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

三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军事理论。陈毅指出,中国历代的军事理论只是“在研究两个国家间的,或两个统治阶级间的战争胜负问题,而我们的军事学派则在回答被压迫人民如何能战胜强大的统治者和侵略者的问题”,因而历代的军事学派只能“就军事本身如技术、武器、战法等问题着眼去加以研究”^③。毛泽东军事思想却是站在社会全局和人民立场上研究军事战争问题,创立了人民战争理论,把游击战争从战术的地位提到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中国历代军事学派不曾提出的新观点、新战术、新方法。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给我国兵法宝库增添了全新内容,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问题

“一般军事家谈战略、战术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其中能背诵几页战史便算高人一等。毛主席谈战略、战术是如何使中国人民军队能够打胜强大敌人,这是有具体内容的,连血带肉的,与长期战争相联系的战略战术,这样便自然而然地从解决新的问题中,提供新的经验和创造新的原则。”^④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指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动力,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问题。

(一) 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性质

其一,政治和军事紧密相连辩证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列宁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⑤,因而在分析战争时必须着重分析这场“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⑥。毛泽东吸收了列宁的思想,认为战争伴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的诞生而诞生,战争的本质是解决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⑦中国民主革命战争的胜利本质上是革命必然战胜反革命、民主必然战胜专制、正义必然战胜野蛮、进步必然战胜退步的历史辩证法的胜利。

其二,战争引起革命,革命消灭战争,革命是实现战争自我否定自我消亡的中间环节。世界近代战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对抗的表现形式,也是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矛盾动力形式。列宁曾摘录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一句话并对之非常赞赏:“世界大战迫近。但是战争意味着革命。”^⑧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指出“当前这场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注)产生于帝国主义”,而“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开创一个社会革命的纪元”^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使得中国的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决定了党必须要坚持同资产阶级争夺对战争和军队的领导权,确保中国民主革命战争的前途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即为了消灭世界战争而进行的战争。

①《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

③《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页。

④《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页。

⑤《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246页。

⑥《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480页。

⑧《列宁全集(第5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3页。

⑨《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4、296页。

其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地考察战争的性质和类型,一分为二地看待战争及其历史作用。列宁指出,“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①,而判断战争的性质必须要基于对引发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分析。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思想,指出分析战争的性质是确立中国共产党人对战争态度的基础:“战争的性质是根据于战争的政治目的而定的……照斯大林同志的说法,战争分为:(一)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二)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②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是承担着全人类解放和世界永久和平的神圣使命的。因此,对待中国民主革命战争,党不但不应反对,反而要积极参加,并为争取永久和平而奋斗。

(二)指明中国革命战争的依靠动力

在中国民主革命战争中,以弱小进步的革命力量战胜强大退步的反革命力量,关键在于依靠工农群众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因为“兵民是胜利之本”^③。

兵民是胜利之本,必须处理好官与兵之间的辩证关系。政治工作是实现人民军队内官兵一致的重要抓手。“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④。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核心在于启迪军队官兵的阶级觉悟。“练兵必先练心,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练兵必先政治着手。练心就是做政治工作,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从不觉悟到觉悟。”^⑤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军队内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制度,通过发动军队生产运动进一步改进官兵关系。正确处理官兵之间的辩证关系实质上是正确处理军队内的集中与民主的关系。

兵民是胜利之本,必须处理好军与民之间的

辩证关系。一方面,“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⑥,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是正义的、进步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天然处理好军民关系和做好政治动员工作的优势。另一方面,党所领导的军队的主要来源又决定了党必须要处理好军民关系。“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⑦人民军队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实行军民一致,就必须和百姓同甘共苦严守军纪,注重军队的政治工作建设,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工作,不断改善根据地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兵民是胜利之本,必须处理好敌与我之间的辩证关系。敌与我本是对抗的,两军交战的根本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人民军队只消灭拼死抵抗的顽固之敌,而不消灭愿意投诚和反正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否妥善处理好敌军俘虏问题关系到战争胜败。毛泽东曾指出,“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所以以后失败了”^⑧,“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⑨。因此,人民军队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注重加强对敌军俘虏进行思想政治改造工作。对俘虏过来的士兵让其自己决定去留,对其中受伤人员进行医治,向俘虏讲述我军的生活习惯、斗争历史、革命宗旨,普及阶级斗争的政治常识,以此尽最大可能瓦解敌军斗争意志并增强我军有生力量,实现敌我转化。

(三)阐发中国革命战争的辩证规律

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战争、军队和国防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历史的辩证法在于只有这些事物自身才能消灭自身。其一,只有依靠战争才能消灭战争。消灭战争的方法只能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⑩,幻想以妥协退让求和平是极端幼稚的。其二,只有强化军队才能消灭军队。军队是阶级力量的体现,是阶级斗

①《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

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10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8页。

⑧山东省档案馆:《毛泽东与山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争的工具。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本身不能放弃这一工具,反而要强化它。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强化人民军队,以此为条件才能“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①。其三,只有加强国防才能避免国乱。“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②备战方能避战,能战才能止战,只有加强国防建设才能避免侵略战争,才能真正维护国家和平。

战争中普遍与特殊的辩证规律。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从一般到特殊依次分析了战争、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三个范畴,指出在具体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时要因时因地因人作具体的军事决策。朱德把中国共产党的用兵方法概括为三条:“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③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原理在军事战争中的具体应用。

战争中全局与局部的辩证规律。战争局部构成战争全局,但战争局部却被战争全局所决定,“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④。军事战争中,社会是最大的全局,政略研究的是这个最大的全局,战略研究的是战争的全局,战术研究的是战争的局部。因此政略决定战略,战略决定战术。“党军的战略服从政略,政略确定了,战略也就是跟着决定了,战术跟着也决定了。我们的各级参谋人员一定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战争服务。”^⑤例如,初战是战役全局的第一阶段,但对初战的组织要极其慎重,要视战役全局和之后阶段发展需要反过来去制定初战计划。

战争中主动与被动、优势与劣势的辩证规律。优势地位和战争主动权不是一成不变的,化劣势为优势、转被动为主动的方法之一是实施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通过巧妙的战略战术在战争局部

造成敌弱我强的状态,“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⑥。这里,行军的自由权尤为关键。因为军队是否具有自由行军的权利决定了其能否以主动的姿态进攻、撤退或转移,借以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从而获得战争主动权和积累战争优势。另一方面,广义上来说战争中存在着两种优势: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因此,另一种方法便是运用政治上的优势弥补军事上的劣势,把政治上的优势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聂荣臻指出:“敌以不义之侵略战,对我正义之保卫战,政治上之优势在我而不在敌。故我须以政治上之优势与军事斗争相配合,以对抗敌之军事优势,从而在各种复杂斗争中改变敌我之优劣形势。”^⑦

“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规律。在战略上,必须把帝国主义反动派看成纸老虎,认识到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战略上轻视敌人的观点,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⑧,基于这一点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在战术上,又必须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会吃人的真老虎,因而“对弱的敌人也要当强的敌人打”^⑨,基于这一点建立我们的战术思想。总之,军事战争中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要有强大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勇气,具备藐视敌人和敢于斗争的气概;也要有充足的军事才略和战术智慧,具备消灭敌人和善于斗争的能力。

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军事理论相结合丰富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内容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筑军事辩证法思想基础上,批判继承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军事理论精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兵家文化相结合,系统论述了积极防御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2页。

③《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⑤《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

⑦《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页。

⑧《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

⑨《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

中攻守进退和人地得失的辩证法、抗日战争中内线持久防御战略和外线速决进攻战术的辩证法、军事指挥中集中分散和强弱转化的辩证法,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内容。

(一) 积极防御中攻守进退和人地得失的辩证法

面对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既要反对“有退无进”的消极撤退,也要反对“有进无退”的盲目进攻,而要实行“以退为进”的积极防御。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总是曲折往复的,军事战争也并非直顺遂的。进攻之前需要首先实行退却,高明的防御手段往往蕴藏着反攻的积极要素。为更好说明这一辩证法原理,毛泽东引用《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指出面对敌军来势汹汹的进攻我军不能直接上阵同其拼消耗,而要像林冲一样先退后一步。军事上退后的目的有三:一是利用战略退却获得侦查敌军兵力分布和配比的时间,为认识敌我双方具体情况以部署后续军事行动获得缓冲时间;二是将敌军引入我方根据地,通过坚壁清野的政策消耗敌军整体的战略优势,“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①;三是我军以逸待劳乘敌之隙,人为造成敌方之过失,通过积极的政治动员和建立有利的作战阵地,最终在战争的局部创造出我方优势,以我局部之优势攻击敌局部之劣势,一击而胜,再及其余。

实行以退为进的积极防御战略,核心是要正确处理人地得失的辩证关系。“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老子·第三十六章》)战国时期,任章用“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②向魏桓子献言面对知伯无理索要晋国的土地时所应采取的策略。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充分吸收和改造了中国古代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并结合中国近代革命战争实际说明阐述了军事战争中若要以弱胜强则需存人失地的战争辩证规律。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多寡,而不是看占有或保守土地的多寡。“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③,这就是积极防御战略中的人

地得失辩证法。

积极防御战略中的人地得失辩证法,其本质上是战争的流动性和战争计划相对固定性的统一。所谓战争的流动性,就是指军队作战时,其作战战线和领土的不固定性。毛泽东指出,领土的流动性由战争的流动性决定。对于弱军作战来说,作战战线和领土的不固定性表现尤甚。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反对战争的流动性,结果被迫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流动。因此,战线的不固定性不但是弱军对战强军的特点,更是弱军战胜强军的关键——“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④所谓战略方针的相对固定性,是指尽管作战战线和所占领土在迅速变更流动,然而指导战争的全局计划和战略方针却要相对固定。战争虽然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但却有相对的确定性。只有基于相对的确定性制定正确合理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才有可能掌控整个作战过程的主导权并获得最终胜利。“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⑤,这就是战争流动性和战争计划相对固定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是处理好积极防御战略中攻守进退和人地得失辩证法的前提基础。

(二) 抗日战争中内线持久防御战略和外线速决进攻战术的辩证法

在敌强我弱的抗日战争中,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敌进我退”,我军此时要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⑥,变敌后为前线,创造广阔的敌后根据地,构筑持久抗战的战略基点。由此,中国战场上出现了包围和反包围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这种包围与反包围的情形与中国古代的围棋具有高度相似性。围棋中一方的棋子若被另一方棋子严密包围,造成无气的状态便会被吃掉棋子;战争中一方的部队若被另一方的部队集中起绝对优势兵力严密包围,同样也容易被消灭吃掉。抗日战争如同围棋一般,“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

②刘向:《战国策(第2册)》,高诱注,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91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页。

⑥《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

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①。

从包围和反包围的辩证法出发,可以推导出以下三个辩证情形:(1)敌军在战略上包围我军,因而我军是内线作战,敌军是外线作战,但我军在战役或战斗上以及敌后根据地的游击战中,则是反包围敌军,因而敌军又变为内线作战,我军变为外线作战,这是内线与外线的辩证法;(2)敌军在战略上对我军形成包围,因而在整个战争中我军处在防御地位,但我军在战役和战斗上又反包围敌军,因而在每一个战役和战斗中我军则处在进攻地位,这是防御与进攻的辩证法;(3)敌军在战略上包围我军处于优势地位,因而整个战争必然是持久的,但是我军在每一个战斗中包围并歼灭敌军时则要求速决,以防敌军获得增援时间反包围我军,所以在战役和战斗上必须速决,这就是持久和速决的辩证法。

简言之,抗日战争要在敌军的包围中实现对敌军的反包围,其本质就是要在内线持久防御的战略方针下实行外线速决进攻的战术方针^②。实现这一作战方针,关键要处理好计划性和灵活性的辩证关系。岳飞曾经说过:“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列传卷二百二十四》)毛泽东指出,“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只有“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③。刘伯承认为,存乎一心的这个“‘心’,即唯物辩证法”^④。叶剑英在吸收《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的奇正思想基础上也认为,“言变首先要求常,先把原则搞通”^⑤,遵循唯物辩证法和军事战争的一般规律,才能结合实际的战场形势灵活制定战略战术。

(三) 军事指挥中集中分散和强弱转化的辩证法

首先,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化被动为主动、以弱军胜强敌,“以一当十”战略的基础是“以十当一”的战术。冯梦龙曾在编撰《智囊》时收录了田忌赛马的案例,并于其后加编唐太宗和宋高

宗对孙臬驷马之法在军事上的应用和诠释:“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盖用孙子之术也。”^⑥毛泽东高度赞扬这一战术思想,并在旁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⑦在近代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下,敌军实力远远强于我方,我军只有通过集中兵力在战役或战斗条件下造成局部优势才能击败敌人。因此,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点,反对分散兵力处处设防、处处攻击。

其次,集中优势兵力后要打歼灭战,反对击溃战。从近代中国革命战争整体战略上看,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我军必须要实行歼灭战,反对击溃战。只有彻底地歼灭敌人,才能给予强敌以足够的杀伤,才能及时补给我军消耗和巩固我方根据地。但具体到革命战争的局部战术而言,又要视具体情况决定打击溃战还是歼灭战。“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孙子兵法·军争篇》)的用兵法则被历代兵家视为圭臬,然而粟裕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中国革命战争的复杂情况后指出,“‘围师必阙,穷寇勿迫’的用兵法则,其实需要具体分析和灵活运用”^⑧。如果敌军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则应对之四面包围,不使漏网,务求全歼;如果敌军能够迅速地互相支援,此时若再集中我军兵力对敌严密包围,就很容易被附近的敌军集中起来对我军进行反包围,此时就应该“围师必阙”,即“两面或三面包围”,“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⑨。

再次,对敌各部分实行歼灭战的顺序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毛泽东曾引用这段话说说明先打实力较弱的王金珏等部,最后打实力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④《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51页。

⑤《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

⑥《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

⑦《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

⑧《粟裕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65页。

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较强的第十九路军的必要性。毛泽东吸收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中提出的敌我双方强弱转化的规律及其条件的相关思想,结合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①完全主动作战方针,同时根据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进一步规定了面对敌军不同守备情况的地带、城市和据点时所应当采取的正确夺取的战略顺序,成为十大军事原则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正是毛泽东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攻坚则韧、乘暇则神”等古代传统军事战略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另一方面,军事作战不能一味强调集中兵力,在适当时机亦要视情况分散兵力,充分发挥分兵以发动群众、消耗敌军和钳制敌军的三重作用。其一,发动群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and 支援作战是我军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而民众分布广泛而稀疏,不像敌军那样大量集结在一起,因而我

军要发动群众则只能采取分散兵力的方式。其二,消耗敌军。“以我之集中,歼灭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袭击敌之集中。”^②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军事武器和兵员训练远在我军之上,因而我军的作战方针必须要从运动战及时转换为游击战,实行“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③,依托有利地形和小股部队的灵活性骚扰消耗敌军。刘伯承对此总结指出:“其兵力如集结过大,则易遭我适时分遣的消耗;如分散过小,则易遭我适时集结的消灭。日寇军中一句谚语:‘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军大大的有。’”^④其三,钳制敌军。例如,在指挥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在我军有充足兵力和敌军已经集中了相对优势兵力的情况下,一反集中兵力的原则采取了相反的做法,通过分兵阻击钳制徐州东援的邱清泉、李弥兵团,成功实现了截断敌军海上逃路、孤立并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战略意图。

On the “Two Combina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Military Dialectics Thought

LI Ge & XUE Tianre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military dialectical thought was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and a brilliant example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approach explored and realiz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th Comrade Mao Zedong as their chief representative. Mao Zedong combined Marxism with the practical realities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uncovering its nature, identifying its driving forces and expounding its principles, which addressed a series of practical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war. Guided by the Marxist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on the war, Mao and his colleagues thoroughly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theory. They combined Marxism with the essence of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 and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e dialectics of advance and retreat, gains and losses of soldiers and land in active defense, the dialectics of protracted defense on interior lines strategy and offense of quick decision on exterior lines tactic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dialectics of 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ion in military command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rength and weakness. Their work enriched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and achieved both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thought.

Key words: Mao Zedong; “two combinations”; military dialectical thought

(责任校对 唐尧)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②《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5页。

④《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287页。